

# 秦贯撰《郑崔合祔墓志铭》真伪考辨 1

伏涤修 1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 年第 4 期

—

摘要：明清时期屡有记载言发现唐代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对此墓志铭的真伪及墓葬主人与《会真记》、《西厢记》原型人物的关系，明清人莫衷一是。本文对明清时期著录、记述《郑崔合祔墓志铭》的相关金石、文史资料进行了梳理与考辨，认为此墓志铭应为真，由于墓葬主人姓郑、姓崔，他们被附会成《西厢记》的原型人物。至于此墓志铭异时异地屡屡出土、墓葬主人名讳不同，则是在《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下人们对此墓志铭被作了复制、改造的结果。

关键词：郑崔合祔墓志铭；真伪；考辨

唐代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全称为《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在明代以前未见记载，而在明清时期则屡被发现，各种文献记载中不仅此墓志铭的出土时间与地点有异，而且所云墓葬主人郑氏的名讳也有不同，这样文人们对此墓志铭的真伪及墓葬主人与《会真记》、《西厢记》原型人物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在此墓志铭是真是假、此墓葬主人与《会真记》、

《西厢记》的原型人物有无关系等问题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此墓志铭根本就是明代人的伪造之物，有人认为此墓志铭不仅为真，而且墓主就是《西厢记》中郑恒、崔莺莺的原型人物，也有人认为此墓志铭存有疑点太多，真伪难以定论。笔者对明清时期著录、记述《郑崔合祔墓志铭》的相关金石、文史资料进行了梳理与考辨，认为《郑崔合祔墓志铭》确曾存在，但墓葬主人与《会真记》、《西厢记》原型人物并无关系，至于此墓志铭异时异地屡屡出土、墓葬主人名讳存有不同，则是在《西厢记》的巨大影响下此墓志铭被人们作了复制、改造的结果。

—

明清时期金石、文史学家对于唐代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多有著录与记载，他们绝大多数是认定此墓志铭为真的。明末清初顾炎武在其《金石文字记》中著录：“《郑恒暨夫人崔氏墓志铭》，秦贯撰，正书，大中十二年十二月”，顾炎武在著录后还有一说明：“此即今世所传崔莺莺者也，年七十六，有子六人，与郑

合葬。此铭得之魏县土中，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①]（卷五）从这里可以看出，顾炎武是相信此墓志铭为真且认为此墓葬主人崔氏就是崔莺莺，他把墓志铭文当作为崔莺莺洗刷私合之耻的证据。顾炎武的这一著录被人们广为征引，清代徐乾学《读礼通考》一方面根据顾氏著录对郑崔墓志铭作了记载，另一方面还言他曾亲见此墓志铭的拓本，徐氏道：“及见《金石文字记》，有……《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秦贯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郑府君志系拓本，予曾见之。”[②]（卷九十九）清代李光暎《金石文考略》也记录了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的此段文字，只是将墓志铭换题为“《郑太常恒暨夫人崔氏墓志》”，《金石文考略》还记录了《旷园杂志》（吴陈琰）、《容台集》（董其昌）中的相关记述[③]。清代倪涛《六艺之一录》在“卷七十四·石刻文字五十·唐碑”条中也记载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的全文，不过将墓志铭换题为“《郑恒夫人崔氏墓志铭》”[④]。《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在“卷六十三·历代无名氏书五”条中也著录了上引的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的文字[⑤]。此外，《钦定续通志》在“卷一百七十·历代石刻·唐”条中记有：“《郑太常暨夫人崔氏墓志》，秦贯撰，正书，大中十二年，卫辉”[⑥]。毕沅《中州金石记》[⑦]卷三对此郑崔墓志铭更是有详细的记载和考辨。甚至连经部小学类的著作，也对此墓志铭有所记载，吴玉搢《别雅》卷五在解释“淇隩”时，言：“淇隩，淇澳也。见《郑恒墓志》。”[⑧]

除了金石、书刻等专门文献外，文人们的其他著作对秦贯所撰郑崔墓志铭的记载更多。以明代人的著述而言，陈继儒《古文品外录》、董其昌《容台集》、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附录》、顾起元《说略》、邓伯羔《艺彀》中就都对此墓志铭予以了记载，以上诸人主要生活在万历前后。王骥德在他的《校注古本西厢记·附录》中收录了秦贯所撰此墓志铭（全称为《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的全文，王骥德校注本中还收有嘉靖年间刘丽华的《题辞》，《题辞》言“长君尝示余崔氏墓文，乃知崔氏卒屈为郑妇”[⑨]，说她曾从长君那里见过墓志铭文。以上诸人均未对此墓志铭的真实性表示怀疑，陈继儒不仅相信墓志铭为真，他甚至还据此撰文为崔莺莺辨诬。明代邓伯羔《艺彀》记述了他见到此墓志铭拓本的过程：“姑熟吴公，一好古博雅士也，与余善，尝拓一纸示余，而志其后曰：往外舅安斋翁教睢州，得是碣于州之蒍圃者，始尘淖不可读，已而得其大凡。蹶然曰：此崔氏家乘也，岂造物者欲雪其诬，乃出是以平反之乎？不然，苔封烟锁

几世几年，以此时显耶？”[⑩]（卷下“《西厢》传奇”条）从记述可见邓伯羔笃信此志为真，他认为此墓志铭的出现是天意要为崔氏夫人雪诟的显现。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考》对秦贯所撰此墓志铭加了按语，称墓葬主人“郑恒故笃行贤者，崔氏亦婉婉可师。”王骥德还写有《墓志铭后识》，王氏虽然认为此墓葬主人与《西厢记》所写人物无关，并且对此墓志发现于不同地方心里存疑，不过他还是相信此墓志的真实存在的。顾起元《说略》卷九中的相关文字应是抄自王骥德《墓志铭后识》，顾氏对此郑崔墓志铭的态度与王骥德一样，虽不认同墓葬主人与《西厢记》原型人物有关，但认为此墓志为真。

清代人关于此《郑崔合祔墓志铭》的记述更多，毛先舒《诗辨坻》、王弘撰《山志》、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吴陈琰《旷园杂志》、祁骏佳《遯翁随笔》、陈大士《已吾集》卷四十、钱大昕《金石后录》（后更名为《金石文字目录》）、袁枚《隋园诗话补遗》卷七、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小栖霞说稗》、俞樾《小浮梅闲话》等都有记载。其中王弘撰、祁骏佳等人是笃信此墓志铭为真的，他们还以此墓志铭为据来攻击《会真记》、《西厢记》，其他一些人，如毛先舒、吴陈琰、俞樾等人，虽然因为此墓志铭异时异地出土、内容上有出入而感觉有可疑、不可理解之处，甚至觉得有造伪的成分，但是他们还是倾向于认为此墓志铭的真实存在的，他们认为此墓志铭确系为真，但是后来另有他人改造、伪造了此墓志铭。

清代也有人认为此墓志铭是人为造假的贗物，如毛奇龄、杨复吉等，不过综观明清时期金石、文史学家们对《郑崔合祔墓志铭》的著录、记述可以看出，多数人是认为其真的，有人虽然存疑，但是并没有举出足以证明其假的理由来。

## 二

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在各家著录、记述中颇有牴牾，各家在其出土地点、出土时间、墓主郑氏名讳的记载上，存有明显的不同，这是人们对它质疑乃至否定的主要原因。以出土地点而言，有内黄、汲县、旧魏县、临清、磁州、浚县、睢州等说法，以出土时间而言，则有明代成化、崇祯、清代康熙年间等说法。王骥德对郑崔合祔墓志铭所写的《后识》就引述了当时的两种说法：一种是说墓碑出于内黄野中，一种是说墓碑出于汲县，“‘按《墅谈》：近内黄野中，掘得《郑恒墓志》，乃给事郎秦贯撰。’……又传：汲县令葺治，得石于地中云云。”（《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后识》，见《校注古本西厢记考》附录）清代王弘撰《山志》言此墓志铭是出于旧魏县，“……此见《崔夫人埋志碑》，成化间

出于旧魏县废塚。”[11]（《山志》初集卷四“传奇”条）吴陈琰《旷园杂志》记载了此墓志铭成化年间出于淇水西北五十里的旧魏县和康熙年间出于临清的两种说法，“唐郑太常恒暨夫人崔氏莺莺合祔墓在淇水之西北五十里曰旧魏县，盖古之淇澳也。明成化间，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给事贯所纂志铭在焉。……或传此志铭又于康熙初年崔氏见梦于临清州守，守往学宫，自秽土中清出。”[12]。杨复古

《梦阑琐笔》除了记载转述以上几种说法外，还记载了明崇祯甲戌之年出于磁州的一种传法，“东平宋十河又称，全椒张贞甫为磁场守，有民发冢得崔郑志铭”

[13]。张颢渊《郑崔合祔墓志铭》跋语（载章有谟《景船斋杂记》）则称墓志铭发现于浚县，“余宰浚，方得原刻。”毕沅《中州金石记》也记载了出土于浚县的两种郑崔墓志铭，“《郑恒崔夫人合葬墓志》，大中十二年二月立，秦贯撰，正书，在浚县。……又一碑文字悉同，府君讳恒，字作遇，……二碑俱在浚县。”[14]

（卷三）俞樾《小浮梅闲话》所记墓志也是在浚县。从前引邓伯羔《艺穀》可知，还有在睢州发现墓志的说法。出土时间上，除了上面已提的明代成化、清代康熙年间之说外，毛奇龄则又引他人言语说此墓志铭是在明代崇祯年间发现的，“临安汪然明，于崇祯甲申岁刻《西厢记》，其《发凡》有云：‘崔郑元配墓志，崇祯壬申方发于古冢。’”[15]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考》收有嘉靖年间刘丽华的《题辞》，《题辞》说她曾亲见郑崔墓志铭文，志铭“未书郑讳氏”，这说明刘丽华所见与成化年间出土于旧魏县的墓志铭不是一回事，刘丽华未言及墓志出土时间，如此看来，刘氏所见当是出土于嘉靖年间或之前的一种墓志铭。

关于墓中男主，文献中有这样几种说法：一是只言郑恒之名未言字讳，二是言他名恒字伯常，三是说他名恒字遇，四是说他名郑遇。多数金石、文史著作言墓中男主叫郑恒，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考》、顾起元《说略》、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李光暎《金石文考略》中所引各家记载、毕沅《中州金石记》、倪涛《六艺之一录》、《钦定续通志》等都这样记录。其中著录、转述性的文献中绝大多数只言郑恒姓名，未言字讳，但在秦贯所撰志铭中是有墓中男主字讳的，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考》引有秦贯所撰志铭原文，称“府君讳恒，字伯常”，名与字均作了交待。前引毕沅《中州金石记》言：“《郑恒崔夫人合葬墓志》，……又一碑文字悉同，府君讳恒，字作遇。”（卷三）[16]又言墓主“讳恒字作遇”。清初毛先舒《诗辨坻》言他见过名郑遇的墓志铭拓本：“后余见此拓，楷书微兼隶体，笔意犹古，而辞亦质雅，第志称府君讳遇不讳恒。”[17]（卷四·“词曲”条）清代俞樾

也言郑崔墓志铭有两种：“然此有二碑：一碑云‘府君讳恒’，一碑云‘府君讳遇’，文皆相同。”[18]（《小浮梅闲话》）

此外，关于此郑崔墓志铭的文字，也略有不同，王骥德校注本所附秦贯所撰此墓志铭云郑崔有一女六子，六子“长曰珙，……次曰珮，……次曰瑾、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而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三所记郑恒之子是“子曰琮、曰瑾、曰玘、曰璿、曰琬”[19]，不仅只写五子之名，而且有两子之名与王骥德校注本所附墓志铭中所记郑恒之子的名字不同。

### 三

下面对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招致人们质疑之处进行考辨。首先，此墓志铭异地异时异文地屡屡出现，这就显露出造假的破绽。清代毛奇龄《论定西厢记·附辨》、杨复吉《梦阑琐笔》“识物”条中的考辨文字对这一点进行了批驳，他们指出：“瘞止一处，不宜各地掘出”，“岂有一志石而瘞无定地、发无定时、文无定名之理”[20]？如果《郑崔合祔墓志铭》确为唐代秦贯所撰，那它只能有一处为真，而不应当各地屡有发现，各地所发现的此郑崔墓志铭至多有一处为真，这其中绝大多数无疑是假。不过墓志铭异地异时发现这只能否定绝大多数而不能据此否定全部，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当真的郑崔墓志铭被发现后，其他人临摹、复制、改造了它。各地所发现的此墓志铭除了男性主人公名讳有异外，其他内容是一致的，改作墓志铭者只在郑氏名讳上作文章，这表明改造者的动机是想藉此将墓中人物附会成《西厢记》的原型人物，以便为崔莺莺郑恒“洗污”“雪诟”。至于原来志铭中所言郑氏究竟应叫郑恒还是郑遇，贗志伪造者是将郑恒名改成了郑遇还是将郑遇名改成了郑恒，清代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毕沅、俞樾为代表，他们认为“恐后人得郑遇碑，改为郑恒，以炫世者。”[21]（卷三）“疑好事者得郑遇碑，而易其名以欺世耳，未足据也。”[22]（《小浮梅闲话》）一种是以毛奇龄、杨复吉为代表，毛奇龄认为也存在将郑恒名改成郑遇名的可能性，这样改动是“故为出脱”、故作疑案，毛奇龄说：

予据世传秦贯所撰《郑恒崔夫人合祔墓铭》，以为《董西厢》入恒之由。后从毛驰黄许见秦贯铭拓，称府君讳遇不讳恒，末有眉山黄恪辨证，而驰黄亦遂笔入《诗辨坻》中，且以驳陈仲醇《品外录》所载之谬。……暨予过秣陵，亲见周雪客所藏志拓，与驰黄所藏同，而中亦称讳恒。是必诸拓所传，原欲实恒名而故为贗志以示有由。若驰黄所藏本则又改恒为遇，为之出脱，实则皆贗物也。[23]

杨复吉《梦阑琐笔》和毛奇龄的观点完全一致，语言也基本相同。笔者以为，假墓志铭存在更改郑氏名的行为是确定无疑的，作贗志者既然千方百计想将墓志铭和《西厢记》相联系，如果真墓志铭根本就不存在，作假墓志铭者就会直接将事主之名定为郑恒；如果有先作假和后作假之分，而先作假者已经将事主之名定为郑恒，那么后作假者就没有必要故作疑案将郑恒名再改为郑遇；只有确实存在郑崔墓志铭而事主名为郑遇，作贗志者出于有意将他附会成《西厢记》原型人物的动机才会将他改成郑恒。

此墓志铭招致人们怀疑的另一重要方面体现在它的志铭内容上。其一是“封舅之地”的说法存在硬伤。王骥德校注本所附秦贯撰《郑崔合祔墓志铭》云：

郑之先，自周王封舅之地，因而氏焉。……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曾祖玄嘉皇，新都长水县令，……祖有常皇，吏部常选，……烈考探贤皇，魏州昌乐朝城莘县令。府君讳恒，字伯常皇，试太常寺协律郎，文业著于当时，礼仪饰于儒行。

先要说明的是，“世斌皇”、“玄嘉皇”等“皇”字是“大”之意，而非皇室之意。沈璟指出，“郑与周同姓，不当云封舅之地。”（见王骥德校注本所附秦贯撰《郑崔合祔墓志铭》眉批）因为郑本姬姓，开国祖先郑桓公名姬友，是周宣王姬靖同父异母的弟弟，分封郑国这件事应当说是“封弟之地”而不应当说是“封舅之地”。其二是郑恒的字与其祖父的字有一字相同，有触讳之嫌。按照常理，后世子孙的名字是不应当冒触先人的名字的，而这里郑恒字伯常，其祖父字有常，均含有“常”字，王骥德在此段文字上加眉批云：“伯常与祖有常相似，不应乃触其讳，殊不可解。”不过这只是按照常理，事实上，唐代人前后代之间姓名缺少避讳的情形确有存在。现在即使我们认为这两处确为硬伤，应该说墓志铭为真的可能性比造伪的可能性要大，因为如果是明清人伪造此郑崔墓志铭，他们会非常小心、格外谨慎，他们会尽力避免让他人捉住作伪把柄的情形发现，他们没有必要在祖孙名字上犯触讳之疑。倒是唐人撰写墓志铭，未必如后世作伪者那样极端用心，偶尔发生知识性错误、或用笔失误、或书刻失误，这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另外，上文已述及，墓志铭很有可能是将郑遇之名改为郑恒的，“郑恒”及字“伯常”为明清人所改、增刻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其三，

毕沅、俞樾等人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指出了此墓志铭事主世系上存

在的问题。按照墓志铭的说法，郑恒以上世系为：“高祖世斌——曾祖玄嘉——祖父有常——父亲探贤——郑恒”，毕沅指出：

按宰相世系表，郑氏有世斌左司郎中，子元嘉长水令，颇与碑合。碑下云：祖有常，烈考探贤，府君讳恒，子曰琮、曰瑾、曰玘、曰璩、曰琬，此世系表所无。世系表又有恒，为守忠之子，在前数十格，不知何故。[24]（卷三）

俞樾也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发现，郑恒并非世斌、元嘉（即玄嘉，清代为避康熙玄烨名之讳而改玄为元）的后代，俞氏说：

据唐宰相世系表，郑氏二房允伯后，实有名恒之人。今浚县有一碑云《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给事郎太常寺奉礼郎摄卫州司法参军秦贯撰。碑称府君讳恒，则即其人也。其云高祖世斌，曾祖元嘉，祖有常烈，考探贤。按世系表，世斌、元嘉，实有之，然恒则敬道之后，世斌、元嘉则敬德之后，与碑固不符也。[25]（《小浮梅闲话》）

笔者检阅了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发现世斌一系只列“世斌左司郎中——玄嘉长水令——延晖”，有关郑恒的谱系是“行俨汲令——守忠剑州功曹参军——恒”，郑恒与世斌、玄嘉之间并无世系直传的关系。笔者以为，这一问题存在这样几种可能性，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如果秦贯所撰此郑崔墓志铭为真而且无错，那么墓志铭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不合的原因就在于欧阳修此表收录不够完全、准确。就目前所知，《宰相世系表》漏收、错收的情形并不少见。唐代郑敬道、郑敬德是北祖郑晔的五世孙，是郑幼儒之子，他们这一系到了郑幼儒的五世孙郑曾、六世孙郑长裕起，十分旺盛，郑长裕的后人有多人担任宰相、御史大夫等朝官、刺史节度史等地方官，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世斌一系所列甚少。至于至整个郑姓，作为唐代的高门大族，在唐代作高官者非常多，《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仅郑氏宰相就列有9人，而郑姓除了《宰相世系表》中所列的9位宰相外，还有4位未被列入的宰相。此外，唐代郑姓担任尚书、侍郎、郎中、常侍、大夫、御史等朝中官员，刺史、节度史、廉访史等地方官员，及将军、司马、别驾、府率、参军、长史、县令等其他官员的，至少要有数百人，现在要想对唐代郑姓为官者进行全部统计已很困难。《宰相世系表》中没有列入不能就说是唐代没有此系此人，而《宰相世系表》中所列入的守忠之子郑恒也未必就是郑崔墓志铭的事主，《宰相世系表》不能作为否定墓志铭事主郑姓世系真伪的全部根据。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秦贯所撰此郑崔墓志铭为真但是有错。当然，秦贯作为墓志铭撰写人，与墓主家族

应当有密切联系，他这样出错的可能性不大；或者是，事主本来并非是世斌、玄嘉的后人，墓志铭撰写者为了将显示事主出身高门而有意将其列入世斌、玄嘉一系的后人。这一问题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此墓志铭为假，错误原因在于明清伪作此墓志铭者。不过，明清时期人们很容易看到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世斌、玄嘉作为《宰相世系表》中所列的人，作伪者不可能不知，大凡作伪者，总是希望所作的假比真的还真实，他们总是会尽量不留破绽地作伪，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在这一问题上不落被他人指伪的把柄，在其他问题上露有作伪痕迹是可能的，在世系表上露出如此低级的易被他人指伪的痕迹，这可能性也不大。这样看来，不论是《宰相世系表》收录郑姓为官者不全，还是秦贯撰写此郑崔墓志铭时有意为事主攀名门，墓志铭为真的可能性都要大于根本就是造伪的可能性。

至于毕沅《中州金石记》中所记郑恒儿子之名与王骥德校注本所附秦贯所撰此墓志铭中郑恒儿子之名的不同，既可能是毕、王二人所见拓本的不同，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仿制、改造拓本时的走样，也可能是毕沅随手记录的笔误。

最后，从墓志铭的文体、语言上看，也难以看出作伪的明显痕迹，精于金石、考据的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相信墓志铭文为真，其他文史大家也没有对此墓志铭的内容提出其他异议。清代毛先舒言说此墓志铭：“后余见此拓，楷书微兼隶体，笔意犹古，而辞亦质雅”[26]（卷四·“词曲”）。因此无论是从外证还是从内证上讲，此郑崔墓志铭为真的可能性远大于原本就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是作伪的可能性。

#### 四

当然，言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很有可能为真，并不意味着此墓志铭的事主就是《会真记》、《西厢记》的原型人物。当《郑崔合祔墓志铭》被发现的消息传出后，确有人相信他们就是《会真记》、《西厢记》的原型人物，他们据此为《西厢记》中的郑恒、崔莺莺“辨诬”“洗辱”，陈继儒、王弘撰、祁骏佳等人是如此，就连金石、文史大家顾炎武也言墓中崔氏“此即今世所传崔莺莺者也”，称墓志铭的发现“足辨《会真记》之诬，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金石文字记》卷五）但是，也有人发现，作为《西厢记》源头的元稹《会真记》，虽云崔莺莺离开张生后又委身他人，但是并未交待所委之人姓名，郑恒之名首见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此外，此墓志铭中崔氏与《会真记》、《西厢记》原型人物崔莺莺在出生年上不合。王骥德就言：



余按：《会真记》虽谓莺莺委身于人，而不著名氏。郑恒之名，特始见于《西厢》传奇，盖乌有之辞也。世以《墓志》之铭偶与乌有之辞合，而郑恒之配又适与莺莺之氏同，遂以《墓志》之崔为莺莺，误也。况《会真记》止言崔氏孀妇将归长安，不言博陵，又无缘葬在内黄。且《墓志》之崔，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终，享年七十有六，溯其生当在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若莺莺之生，《会真记》以为甲子岁，乃兴元元年，少庚申四岁。《墓志》属纻之期，盖得于郑氏家状；《会真记》设帨之岁，必得于莺莺之自言，并不应误。郑恒之配，盖别一崔氏也。（《唐故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后识》）

秦贯《郑崔合祔墓志铭》说崔氏夫人的卒年是“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终于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合祔于先茔之侧。”（见王骥德校注本附录）大中是唐宣宗李忱的年号，大中起讫年是公元847-860年，据此，墓志铭中的崔氏夫人卒年大中九年当是公元855年，郑崔合祔一墓的时间大中十二年当是公元858年。按崔氏享年76岁推算，崔氏夫人生年当在公元780年，这一年是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庚申。查元稹所作《会真记》（即《莺莺传》），莺莺母言女儿在贞元庚辰年是十七岁，贞元也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起讫年是公元785-805年，贞元庚辰年是公元800年，这一年莺莺十七岁，那么莺莺生年当是公元784年，即唐德宗兴元元年甲子。这样，小说中的崔莺莺生年就比墓志铭中崔氏夫人的生年小了四岁，出现了年龄上的牴牾。因此，即使此墓志铭为真，其中的郑崔也与《西厢记》中的郑恒、崔莺莺的原型人物无关。

另外，需要论及的是，此墓志铭中崔氏夫人与《会真记》中崔莺莺生年不合这一点，也有助于印证此墓志铭的非伪造性。如果此墓志铭原本就是明清人造假所为，那么造假者理应使假墓志与《会真记》相合，在《会真记》已经明确交待崔莺莺生年的情况下，造假者如果言定崔氏夫人享年七十有六，他们在核定墓志中崔氏夫人的卒年时，很容易从《会真记》推算得出。墓志中的崔氏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在年龄上出现四岁之差，绝不应是造假者故设疑阵，而应看作为墓志原本就是与《会真记》、《西厢记》无关的唐代墓志铭。

当然，作为唐代人撰写、埋立的此《郑崔合祔墓志铭》在明代以前未见任何记载，这多少令人有存疑之想。不过，不要说埋于墓中的墓志铭，就是立于墓外的墓碑，在千百年间湮灭无闻的也不在少数，此墓志铭久埋地下直至明代才被人们发现这是很正常的事。

考察明清时期关于秦贯所撰《郑崔合祔墓志铭》的争论，可以看到，虽然各家所著录、记载各异，这说明异时异地发现的此郑崔墓志铭中间定然有假墓志，但是缺少有力证据证明此墓志铭原本就是造假的产物，相反，此墓志铭中露出的种种硬伤、及它与《会真记》的不合之处，倒是令人觉得它非造假的贗物。由于人们在辨伪时往往抱着不允许其有误的心态，因此一旦发现其中的错误，就一概认定为这是它为贗志的理由，其实，有些假墓志，由于它们是造伪者精心刻意所为，反而很少露出常识性错误，它们有的比真实的墓志更难找瑕疵。此《郑崔合祔墓志铭》虽然存有瑕疵，但它为唐代人所撰的可能性远大于它是明代人伪造的可能性。

---

1 课题项目：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 2005 年度国家课题（05DB101）。

1 伏涤修，男，1963 年生，文学博士，淮海工学院中文系教授。曾发表《李白诗受后世诗评家贬抑冷落原因论探》、《从〈沧浪诗话〉的被指斥看宋代文学的审美风尚》、《明清时期北〈西厢记〉演唱样式变化考述》等四十多篇学术论文。

[①]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均出于此本，不再另标。

[②] 徐乾学《读礼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李光暎《金石文考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倪涛《六艺之一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钦定续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毕沅《中州金石记》，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四年（1925）版。

[⑧] 吴玉搢《别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附录，《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四十一年香雪居刻本。本文所引王骥德《校注古本西厢记》均出于此本，不再另标。

[⑩] 邓伯羔《艺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文所引邓伯羔《艺彀》均

出于此本，不再另标。

[11] 王弘撰《山志》，何本方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07页。

[12] 吴陈琰《旷园杂志》，见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十二转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杨复吉《梦阑琐笔》，《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影印本，第335页。

[14] 毕沅《中州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0-71页。

[15]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附辨》，刘世珩辑《暖红室汇刻传奇·西厢记·重编会真杂录（上）》，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影印本，第263页。

[16] 毕沅《中州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0-71页。

[17] 毛先舒《诗辨坻》，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

[18] 俞樾《春在堂随笔》附，《笔记小说大观》（十三）影印上海进步书局第二十六册印行本，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局印本，1984年版，第72页。

[19] 毕沅《中州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0页。

[20] 此段文字同时见于毛氏、杨氏论述，《毛西河论定西厢记·附辨》，见刘世珩辑暖红室汇刻传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第263页；杨复吉《梦阑琐笔》，《丛书集成续编》第91册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35页。

[21] 毕沅《中州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1页。

[22] 俞樾《春在堂随笔》附，《笔记小说大观》（十三），第72页。

[23] 《毛西河论定西厢记·附辨》，见刘世珩辑暖红室汇刻传奇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第263页。

[24] 毕沅《中州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0页。

[25] 俞樾《春在堂随笔》附，《笔记小说大观》（十三），第72页。

[26] 毛先舒《诗辨坻》，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页。